



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

特別報道之大營救

東縱「秘密大營救」 數百文化人脫險

楊家村後人憶淪陷時期親歷 難忘共產黨游擊隊熱忱愛民

香港淪陷期間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展開空前絕後的「秘密大營救」，在日寇嚴密封鎖下，將何香凝、鄒韜奮、茅盾、梅蘭芳、蔡楚生等數百名文化人士營救出，轉移往後方安全地帶，奇跡般地完成一場「最偉大的搶救工作」。元朗十八鄉楊家村的適廬，曾是這次大營救中極其重要的「中轉站」。當年親歷者、楊家村的後代楊永光現仍生活於此。楊永光日前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憶述，「楊家村村民從初始的警惕，到後來的為保護游擊隊員寧死不屈，是共產黨的熱忱感動了楊家人。」

大公報記者 劉越琦、常或璠

九華徑，一處滿載歷史的地方，在香港淪陷期間，是進出九龍及新界的交通要道，也是東江縱隊活動的範圍。當年秘密大營救的路線分別為「西線」，行青山公路，經九華徑至荃灣，越過大帽山到元朗十八鄉楊家村，然後渡過深圳河進入寶安游擊區；東線，由九龍經西貢村、沙魚涌、淡水，進入惠陽游擊區。」

游擊隊阻土匪騷擾居民

元朗十八鄉楊家村，環境優美，綠意盎然。80年前，這裏是東江抗日游擊隊的交通站，也是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。「那年我大概五六歲，只模糊記得很多人來過，後來媽媽告訴我，共產黨的游擊隊經常帶來很多人，不止一批，大部分吃頓飯就繼續趕路了，小部分留下住一晚才走。」年屆85歲的楊永光說。當時的香港，社會治安十分混亂，新界區處在無政府狀態。土匪橫行，大小惡勢力佔據，姦淫搶劫，無惡不作。從長輩口中，從親身的感受中，他憶述元朗居民當年的恐慌，時刻擔憂受怕，有的害怕到「夜裏唔敢睡度住，日頭先返嚟」，有的甚至全家逃難，直到共產黨游擊隊的到來，才免受土匪騷擾。

楊永光說，當年游擊隊到來後，主動維持治安，表明為「打日本仔」先至此地，又主動約當地土匪「開會」，要求「唔好再騷擾百姓」。

游擊隊「有槍又有人」，又組織起護村隊，慢慢得到居民信任，趕走土匪。他們先後消滅趕走惡勢力，包括當時盤踞在大帽山的土匪黃慕容等，令到秘密大營救行動更順利，增加村民、過境的民眾、被營救轉移的文化界人士的安全保障。

記者日前實地探訪楊家村，村子的後面是高低起伏的山巒，放眼四周盡是樹林與田間小路，時至今日都沒有行車路直達，他們卻已經在嚴密的封鎖下「人間蒸發」，並在數月之後安然出現在抗日大後方和根據地。這場由黨中央指導、東江縱隊執行的大營救歷時近二百天，擊破日軍、偽軍、土匪設置的重重關卡，共營救出八百餘人，無一失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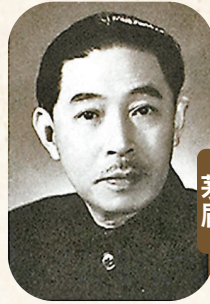
2月7日，受黨中央指示，中共中央



何香凝



柳亞子



茅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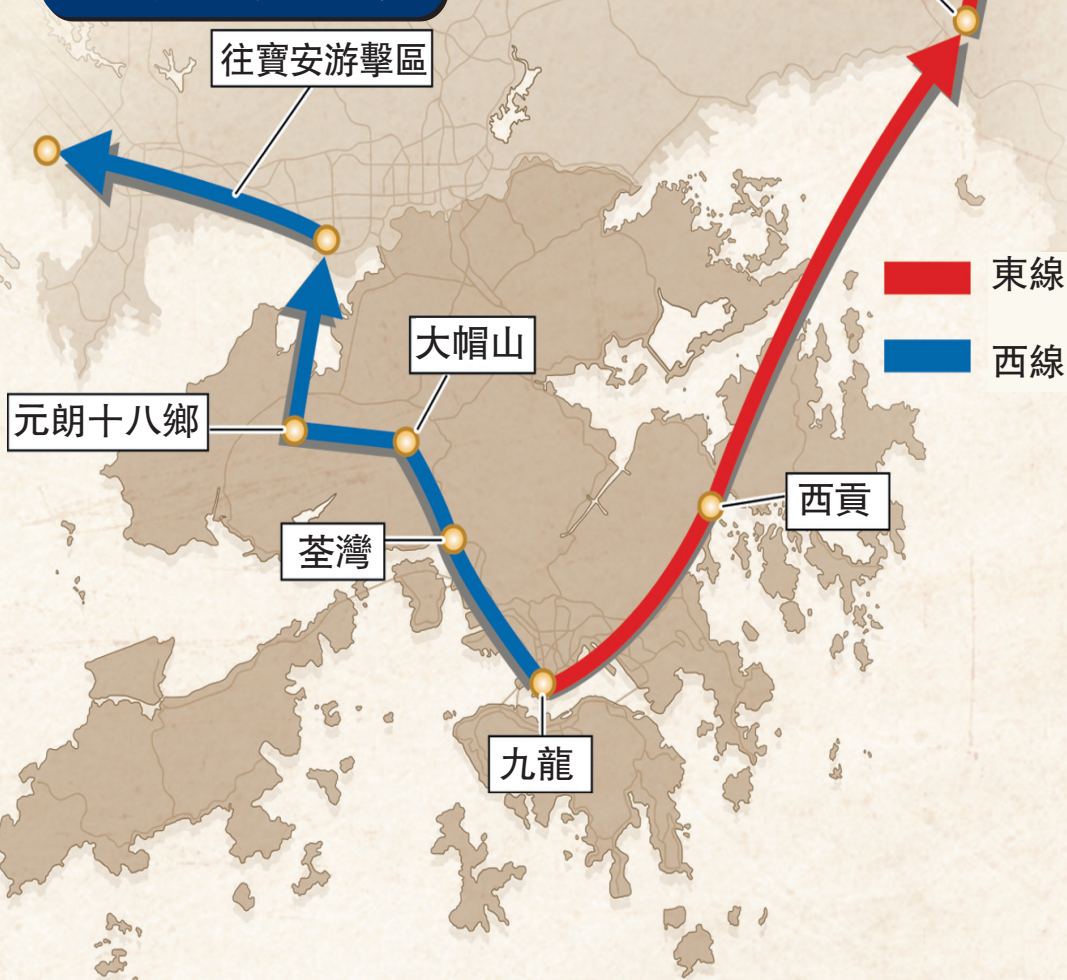


胡繩



楊家村：秘密大營救中轉站。大公報記者文濤攝

秘密大營救路線圖



范長江



鄒韜奮



夏衍



蔡楚生



▲「適廬」曾經的槍支存放區。大公報記者文濤攝

▲楊家村後人楊永光（左）、老戰士林珍（右）。大公報記者文濤攝

充滿防備，從初始的警惕，到後來配合游擊隊員進行抗日，楊永光說，是共產黨人的熱忱感動了楊家人。

此後，楊家村變成了重要的「中轉站」，有人過夜，有更多人則在屋前禾坪暫作休息，「食一餐」就走，楊家人都盡心盡力提供幫助。楊永光記得，「共產黨對我阿媽都好好，態度客氣，仲會幫手煮飯。」

在楊永光的記憶裏，從小到大常聽父輩講述他們經歷的各種戰鬥，抗日故事就是他成長中最真實的教材——營救帶

留香港、被日軍搜捕的何香凝、茅盾和鄒韜奮等著名人士。他說，當時香港淪陷後物資匱乏，日軍大量驅趕在港居民回內地，造成難民源源不斷，於是游擊隊就把要營救的人混入了難民的隊伍，而這條陸路的大營救路線，楊家村是必經之地。

茅盾：抗戰最偉大的搶救工作

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茅盾將這次營救活動稱為「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」。從他寫作的《脫險雜記》中，可

以窺見當年那艱辛的「逃亡路」：1942年1月9日，茅盾夫婦等人被游擊隊帶到皇后大道東的臨時集中點，扮成難民模樣，通過日軍檢查站，在夜暮掩護下登上停靠在避風塘的駁船，與鄒韜奮等人會合。10日凌晨，他們分乘三艘小艇迅速衝向九龍，並在油麻地佐敦休息。11日和12日，他們經荃灣，到元朗十八鄉的適廬歇息一晚，再渡過深圳河。13日，他們一行抵達寶安游擊區的游擊隊臨時指揮所駐地白石龍，並見到了林平等游擊隊領導。

二百天破難關 驚險海陸撤離

1941年12月，香港淪陷，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滯留香港。正當日軍四處刑登啟事，點名要鄒韜奮、茅盾、梅蘭芳和蔡楚生等文化人士前去日軍軍部報到時，他們卻已經在嚴密的封鎖下「人間蒸發」，並在數月之後安然出現在抗日大後方和根據地。這場由黨中央指導、東江縱隊執行的大營救歷時近二百天，擊破日軍、偽軍、土匪設置的重重關卡，共營救出八百餘人，無一失誤。

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兩次急電香港工作的負責人廖承志、潘漢年、劉少文，要求他們迅速做好應變準備，「許多重要民主人士、文化界人士被因留香港，他們是我國文化界的精華，要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。」

據記載，1942年1月9日晚，交通員李錦榮帶領包括茅盾夫婦、張鐵生在內的第一批文化界人士到達銅鑼灣，他們岸邊的一艘小艇：「有黃花魚嗎？」漁人答：「有。」又問：「論斤還是論條？」對方答：「你到船下來看看

吧。」暗號對上了，李錦榮才安心地帶大家上船，隨後與鄒韜奮、胡繩、廖沫沙等人會合，在九龍悄然上岸。

此後，他們通過九龍城，走上直通元朗的青山道，又經過一條狹窄的山路登上海拔九百多米的大帽山，再穿過隱秘的山谷。

夏衍機警講日語避搜查

海上線路的艱險自然也不比陸上要少。夏衍、金仲華、范長江一行21人就在途中經歷了日寇的盤問查詢，驚險萬

分。當時，雖然人人都喬裝打扮，蓬頭垢面，電影明星王瑩還是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，對她嚴加盤問。眼見王瑩就快招架不住，千鈞一髮之際，作為共產黨員的夏衍挺身而出，用日語謊稱一行人是商人和家屬，要疏散去長洲，因為害怕才將臉抹黑。幾句日語或許是引起了日本兵的思鄉之情，他和夏衍閒聊了幾句，索性連行李都不查了，大手一揮便放了行。船漸漸行遠，大家都好似絕處逢生，感慨不已。

大公報記者 常或璠

港澳同胞出錢出力援抗戰

香港在中国人民抗日鬥爭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，它曾是華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心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香港市工委和香港海員工委響應黨中央的號召，在港澳地區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。此外，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出錢出力支援抗戰，千餘人回國參加東江縱隊。

香港各階層民眾自始至終關心和支援祖國抗戰。「七七事變」後，在香港以援助抗戰為宗旨的社會團體紛紛成立，廣泛開展活動募集捐款。從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，香港學生賑濟會通過街頭賣花、賣物會、義唱、義演、節食活動等方式，募集兩萬餘港元。

1938年10月，香港同胞將慶祝「雙十節」宴會款項改作捐募寒衣，香港76個商團聯合募集寒衣36萬件。其他賑濟團體、學生界則舉行贈旗募款，採購寒衣及防毒面具。1938年年底，香港九龍新界司機總會的工人師傅，走遍港島、九龍和新界，籌集四千餘港元購買了前方急需的救護車及藥品，開車前往桂林捐獻給八路軍。

1939年初，按照宋慶齡的建議，香港的幾個婦女團體募集了4,500多種中國藝術珍品，運至紐約、巴黎和倫敦出售，所得收入用於中國的醫療救濟事業。此外，1938年8月起，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先後組織了15個工作隊、12個服務團隊、兩個劇團及一個政工隊共500多人回到東江。他們廣泛深入東江城鄉，慰問飢寒交迫、傷病侵擾的同胞，發放救濟糧食和衣物，免費給傷、病員治病，鼓勵受難的同胞行動起來，保衛家鄉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從東江人民抗日武裝建立，再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，先後參加東江人民抗日武裝的港澳同胞和華僑子弟有1,000人以上。